

苏联文学史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苏联文学研究室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苏联文学史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苏联文学研究室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北京市怀柔县孙史山印刷厂印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850×1168 $\frac{1}{32}$ 13印张 324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9,200册

书号: 16215·65 定价: 1.60元

编辑说明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存在不少问题，情况复杂。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苏联文学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在不同时期都曾对我国文艺界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苏联文学的发展道路，乃是我国苏联文学工作者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本书共收十五篇论文。叶水夫的《苏联俄罗斯文学概述》是对半个多世纪苏联俄罗斯文学的综合论述；李辉凡、张捷、吴元迈的文章，分别对“拉普”及二十年代各文学团体的情况、1925年俄共（布）中央关于文学政策的重要决议、三十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批判庸俗社会学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作了介绍和分析；其余则是对一些有影响的苏联作家创作的研究，其中既有高尔基、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费定、列昂诺夫这样的大作家，也有象叶赛宁、阿菲诺干诺夫、布尔加科夫、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及札米亚京这样比较复杂甚至在苏联一度受过批判的作家。每篇文章的作者力求在尽可能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各抒己见，观点上不强求统一。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材料欠缺，书中的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欢迎批评指正。全书由李辉凡、钱善行负责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苏联文学研究室

1981年10月30日

目 录

苏联俄罗斯文学概述	叶水夫 (1)
“拉普”初探	李辉凡 (18)
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纲领性文献	张 捷 (65)
——重读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	
三十年代苏联的文学思想	吴元迈 (99)
高尔基简论	张 羽 (126)
阿·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探索	李邦媛 (168)
谢尔盖·叶赛宁	王守仁 (190)
阿菲诺干诺夫的戏剧探索	郭家申 (208)
论肖洛霍夫的创作	孙美玲 (231)
论费定	钱善行 (267)
列昂诺夫的创作	王 燎 (305)
左琴科简论	顾亚铃 (333)
布尔加科夫及其创作	童道明 (353)
安娜·阿赫玛托娃	王守仁 (368)
札米亚京及其文学活动	薛君智 (385)

苏联俄罗斯文学概述

叶 水 夫

1917年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翻天覆地的历史转变不能不使文学发生根本的质的变化。苏联俄罗斯文学是继承和发展了俄国古典文学优秀传统的一种新型的文学。

关于苏联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分期问题，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苏联出版的著作一般分为：一、国内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二、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三、农业集体化时期；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五、卫国战争时期；六、战后时期；七、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时期。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版的著作大多按年代划分：一、十月革命和二十年代；二、三十年代；三、卫国战争时期；四、战后时期；五、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时期。最近又有一些学者认为苏联社会发展的时期不能分得太碎，文学也是这样，主张把文学发展分为两大时期：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的时期和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我们认为，六十多年来，由于苏联社会现实和苏共文艺政策的变化，苏联俄罗斯文学还是区分为以下三个发展时期较为适合：一、从十月革命胜利到三十年代初期联共（布）中央发表《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以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二、从三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中期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其中包括四十年代上半期的卫国战争阶段；三、

从五十年代中期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今天，其中又可分为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两个阶段。这三个时期前后互相联系，其共同特点是：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强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的创作方法。各个时期又有其复杂的内容和不同的特点。

一、从十月革命胜利到三十年代初期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了种种条件，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列宁宣布：“艺术属于人民。”革命把一切文化遗产变为劳动人民都能享受的精神财富。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作家按其政治倾向可分成三类：有的在革命前就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加或支持革命；有的敌视甚至恶毒攻击革命；大多数人则虽然同情革命，但暂时持观望态度，或侨居国外。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勃留索夫、勃洛克、别德内、马雅可夫斯基等属于第一类，是年青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而高尔基又是它的奠基人，他在团结具有民主倾向的作家、帮助他们转向革命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列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等人属于第二类。许多属于第三类的作家，其中包括曾经一度侨居国外的阿·托尔斯泰，后来都逐渐转向革命，并对苏联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革命胜利初期，文学中首先出现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充满激情和信心的诗歌：别德内的《关于土地、关于自由、关于工人的命运》（1917）、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和《艺术大军的命令》（均1918）、勃洛克的《十二个》（1918）、勃留索夫的《在这样的日子》（1921）以及一些工人诗人的诗歌。稍后，小说和戏剧也开始取得显著的成绩。二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以革命为中

心题材的小说中，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描写虽然存在过抽象的公式化和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但革命的性质，革命队伍的自觉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却受到愈来愈多的注意，如符·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 14—69》(1922)、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1923)、列昂诺夫的《獾》(1924)。新社会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精神冲突，在李别进斯基的《一周间》(1922)、费定的《城与年》(1924)、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1926)、巴别尔的《骑兵队》(1926)中得到了不同的体现。这时，富尔曼诺夫在《恰巴耶夫》(1923)中塑造了一个被革命唤醒的人民英雄的典型。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描写了历尽千辛万苦、经过革命熔炉锻炼的人民群众的觉醒。在法捷耶夫的《毁灭》(1926)中，深刻地表现出在战争中进行着人材的精选，在革命中进行着人的改造。在这几部作品中，领导革命队伍的共产党员形象第一次使人感到在艺术上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这些作品把浪漫主义的激情同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表现现实与塑造人物上作了新的可贵的尝试，起了里程碑的作用。

与此同时，叶赛宁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精神危机后也展示了他的才能，写出了一批歌颂祖国、歌颂大自然的优秀抒情诗篇。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反映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表现工人阶级解放了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的作品不断出现，革拉特科夫的《水泥》(1925)是这类题材的第一部重要的小说。对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了出色讽刺的，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臭虫》(1928)和《澡堂》(1929)、左琴科的短篇、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小说《十二把椅子》(1928)、别泽缅斯基的诗剧《射击》(1930)等。革命领袖的作用、革命的社会历史意义、革命年代的社会冲突，在更大的范围和深度上引起诗人和剧作家的思考，如散文方面高尔基的特写《列宁》(1924—1931)，诗歌方面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1924)和《好！》(1927)、叶赛宁的《安娜·斯涅金娜》(1925)，剧本方面特列尼约夫的《柳波芙·雅罗瓦雅》

(1926)。

高尔基听从列宁的敦促，从1921年起出国养病，这时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和表现俄国剥削阶级必然灭亡的长篇《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他虽然远离祖国，却仍和国内文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仍然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参加者。

三十年代初，国家工业化不断向前发展，农业集体化全面铺开。联共（布）中央在1931年关于出版工作的决议中号召作家“更深刻更完满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阶级斗争的英雄气概，反映社会关系的改造和新人即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们的成长”。作家们响应了这个号召，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反映工业建设的蓬勃景象和工人群众的忘我劳动的小说有列昂诺夫的《索契河》(1930)、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1930—1931)、卡达耶夫的《时间啊，前进！》(1932)、伊林的《大传送带》(1934)以及马雅可夫斯基歌颂五年计划的长诗的序曲《放开嗓子唱》(1930)等。最早多方面地反映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精神上成长的小说有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1928—1937)等。同富农的斗争、农民私有心理的克服、农村中社会主义关系的诞生，在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第二部，1955—1960)里得到生动的体现。

在探讨当代题材的同时，许多作家继续注意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题材。三十年代初期，双目失明、身染重病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4)问世，它塑造了一个献身革命和建设的优秀青年共产党员的形象。保尔·柯察金成了全世界进步青年的榜样。“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话成了他们的

信念。维什涅夫斯基的史诗式的剧本《乐观的悲剧》(1933)表现了国内战争时期红军一个团队覆没的悲剧，但这个悲剧却显示了社会主义真理的胜利。

从十月革命到三十年代初期，俄罗斯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各种文艺思想的激烈斗争。这是革命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过渡时期的社会动荡在文学中的反映。五花八门的流派和团体发表各自的宣言和纲领，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存在较久。在1920年，仅莫斯科一地就有三十多个文学团体。十月革命前夕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初期曾起过启蒙和团结的作用，但后来它的理论家鲍格丹诺夫、普列特尼约夫等否认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宣扬建立新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进行摆脱俄共和国家领导的分立主义活动，列宁批判了它的错误观点和分立主义活动，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920年俄共中央还就此专门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件。未来派（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阿谢耶夫）等、“锻冶场”（退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诗人亚力山大罗夫斯基、卡津等）否定古典文学遗产，未来派中有些人甚至以“国家艺术”的代表自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思想上动摇不定的文学团体和流派。影响较大的有：“谢拉皮翁兄弟”（费定、吉洪诺夫、左琴科、隆茨等）认为文学可以不问政治，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艺术形式上的实验；“左翼艺术阵线”（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楚扎克等）轻视古典遗产，宣扬“纪实文学”、“生产艺术”、“社会定货”的理论；“山隘”派（沃隆斯基、列日涅夫、普里什文、马雷什金等）夸大艺术创作中直觉和下意识因素的作用，宣扬自我表现。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谢尔文斯基、泽林斯基、巴格里茨基等）夸大技术知识分子的作用，过高估计西欧资本主义文化的意义，而忽视社会矛盾。一批集合在《在岗位上》杂志周围的无产阶级作家，坚决反对文学领域中的资产

阶级影响，但带有宗派色彩，后来成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的核心。由沃隆斯基任主编的《红色处女地》杂志，就建立无产阶级文艺问题与“岗位派”展开论战。它虽然正确地批评了“岗位派”对艺术创作的阶级性的公式化概念，支持“同路人”作家，但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却持怀疑态度。1925年，俄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反对两种倾向，一方面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号召建立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先进的文学，反对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另一方面也反对共产党员妄自尊大，企图垄断文学事业；决议提出应细心周到地对待中间作家，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拉普”（阿维尔巴赫、罗多夫、叶尔米洛夫、法捷耶夫、富尔曼诺夫、李别进斯基和斯塔夫斯基等）在初期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到了二十年代末，它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倾向日益严重，理论上重犯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它的某些领导人甚至提出“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便是敌人”的口号，逐渐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之到三十年代初，大部分作家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各种不同的文学团体的存在已不能反映文学生活的实际过程，也妨碍他们进一步探讨理论原则。因此，在1932年，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拉普”等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把各种文学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作家协会。应该指出的是：一些有才华的作家虽然加入过各种各样的团体，但大多数没有受到所属团体的束缚，而写出了后来成为苏联文学史上的名著的作品。

在捍卫列宁的文艺观点、建设苏维埃文学方面，卢纳察尔斯基有很大的贡献。他深入探讨了党和国家同文学的相互关系，论证了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遗产的重要意义。他最早试图把列宁关于文艺的言论系统化（《列宁和文艺学》，1925），以便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发表过不少

精辟的见解。

1931年，高尔基回到祖国，展开了大量的工作：团结国内外创作力量，创办杂志，辅导青年作家，特别是在总结前一阶段文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与文艺界人士以及党政领导人一起探讨并确定苏联文学的创作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回国后完成的重要作品有剧本《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和《陀斯季加耶夫等人》(1933)等。

1934年4月，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讨论了苏联文学的发展方向和任务，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选举高尔基为主席。在作家协会章程中，对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在大会前后，在大会上，还指出革命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

二、从三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中期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提出的几项重要任务：同当代的迫切问题和党的政策保持紧密联系、真实地反映生活、不断完善艺术形式，在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中逐渐收到效果。

三十年代中期以及以后出现的马卡连柯的小说《教育诗》(1933-1936)，描写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和集体对流浪少年儿童的教育作用，马雷什金的《穷乡僻壤的人们》(1937-1938)表现了偏僻地区的人们参加工业生产后精神上的变化，克雷莫夫的小说《油船“德宾特”号》(1938)显示了人们在社会主义竞赛中面貌

的改变。这都是三十年代文学特别注意新人成长这一主题的收获。

这个时期，完成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小说。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在十月革命前四十年的广阔背景上深刻地表现了俄国知识分子中间尖锐的思想斗争和各个阶级的命运，揭示了反社会主义思想和市侩主义的破产。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1928-1940)通过一个哥萨克中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时期的经历，反映了顿河地区哥萨克社会的变化、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反革命暴乱的平定，在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中显示出新世界诞生的复杂而困难的过程。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1920-1941)描绘了优秀的旧俄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命运以及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法捷耶夫的长篇《最后一个乌兑格人》(1930-1940，未完成)描写的是国内战争时期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的活动以及少数民族乌兑格人的觉醒。

在三十年代中期和后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抒情诗人，如施巴乔夫、普罗科菲耶夫、斯梅里亚科夫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春草国》(1936)是反映农业集体化的抒情的叙事诗。伊萨科夫斯基的许多诗成了群众性的歌。出现了列宁题材的重要作品，戏剧方面有波戈廷的《带枪的人》(1937)，小说方面有莎吉娘的《乌里扬诺夫一家》(1938，修订版1957)。在三十年代后期，战争风暴的预感愈来愈强烈，保卫祖国的主题也愈来愈多地受到作家们的注意。

在三十年代下半期，理论界进一步批评了某些人对待古典文学遗产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力图解决文学中的人民性问题；同时也比较深入地进行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讨论。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奋起抗击，壮烈的卫国战争历时四年。在这期间，苏联文学工作者集中力量为前线和后方服务。一千多名作家志愿上前线，吉洪诺夫、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著名作家都以各种身份在部队服役。许多作家和

诗人在战场上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作协总书记斯塔夫斯基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

政论与诗歌最先发挥与敌人作斗争的作用。阿·托尔斯泰、爱伦堡等的政论力图从历史的发展上来阐释祖国的概念，无情地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诗歌方面，列别杰夫-库马奇的《神圣的战争》成了全民的战歌。吉洪诺夫的《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1941)、阿丽格尔的《卓娅》(1942)、安托科尔斯基的《儿子》(1943)以及苏尔科夫、西蒙诺夫、英贝尔、普罗科菲耶夫的诗歌，在苏联人民心中唤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有力地说明了苏联人民的坚毅精神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2-1945)是战时有名的作品，它深刻地表达了人民对战争的看法、人民在战争中的感情。长诗的主人公是俄罗斯士兵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使人民抗敌御侮、取得胜利的种种素质。

剧本和小说也发挥了战斗作用。剧本中列昂诺夫的《侵略》(1942)、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1942)，小说中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1942)、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1943)、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1943-1944)、别克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大道》(1943-1944)，都确认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人在战争中的行为的准则。这类作品帮助党和国家把过去爱好和平的建设者培养成勇敢无畏、严守纪律的战士。

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在战后初期的作品中，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的英雄业绩继续成为主要的题材。法捷耶夫以文献材料为基础写成了长篇《青年近卫军》(1945，增订版1951)，塑造出苏维埃政权下成长的青年一代的优秀代表的典型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以感人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源泉。同样，波列沃依的小说《真正的人》(1946)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它歌颂了苏联人为祖国献身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描

写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还有布宾诺夫、卡扎凯维奇、潘诺娃等的小说以及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如纳罗夫恰托夫、梅日罗夫、万申金、维诺库洛夫等的诗歌。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恢复生产的规模扩大了，许多作品塑造了城乡先进劳动者、生产组织者的典型，小说有巴甫连柯的《幸福》(1947)、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尼古拉耶娃的《收获》(1950)、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1952)等。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生产劳动题材作品中的情节冲突往往是阶级斗争的话，那么这时这类作品中的主要冲突就是对劳动的创造性态度和因循守旧、保守主义的斗争。

费定的三部曲的头二部《早年的欢乐》(1945)和《不平凡的夏天》(1947-1948)(第三部《篝火》，1961-1965，未完成)、革拉特科夫的自传性三部曲《童年的故事》(1949)、《自由人》(1950)和《艰难的年代》(1954)，描绘了革命前后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前者叙述共产党人和艺术家在历史大转变时期的经历，后者再现了农村的濒于破产、渔业工人的繁重劳动以及人民中间革命意识的增长。列昂诺夫的长篇《俄罗斯森林》(1953)通过一个正直的林学家和他的对手之间的斗争，号召人们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的信念。小说既有复杂细腻的心理分析，又富于哲理，森林不时作为“绿色的朋友”的象征性形象出现。

在战后初期，联共(布)中央鉴于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不问政治、无思想性、趋奉唯美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倾向，作出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1946)、《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1946)、《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1946)、《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1948)等四个决议，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相应地作了报告和发言。这些决议和报告的目的是要提高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强调党性原则对文艺创作的重要意义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正确反映现实中的作用，但方式简单，对某些文艺界人士和某些作品的批评不够实事求是，因

此产生了不好的作用。加之从三十年代末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形成，给文学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出现了“指示性的”、简单化的、政治鉴定式的文学批评。四十年代末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被指责为具有世界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思想。出现了一些公式化、概念化、为政治口号作图解的作品。同时，“无冲突论”的流行又滋生了一些粉饰现实的作品。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前夕，苏共中央已觉察到某些问题，如《真理报》发表社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状况》（1952），批判了“无冲突论”，在十九大的总结报告中还提出“需要苏维埃的果戈理和谢德林”，要求文艺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但由于把艺术典型的塑造过于直接地同政治联系起来，一些弊病并未能得到纠正。

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4年底，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对二十年来文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苏共中央在给大会的祝辞中号召作家更深刻地更真实地表现苏联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创造同时代人的鲜明形象，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反对形式主义和无思想性。会上肯定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学成就，也批评了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现实等弊病。也有人对原作协章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述提出异议，主张删去“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认为这句话是某些作家“粉饰现实”的根源。

三、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今天

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中期到今天两个阶段。

在1956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

人崇拜，全盘否定斯大林，使苏联社会生活发生剧烈的动荡，也在文艺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探索。二十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苏联文艺工作者中间，既有思想活跃的一面，也有思想混乱的一面。有人直接提出了过去在文艺工作中的行政干预过多、对艺术规律重视不够，片面要求作品的思想性、忽视艺术性，喜欢歌功颂德、回避生活中的困难和矛盾；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有人对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文学中的正面人物、文学的真实性和描写“阴暗面”等问题提出不同的理解；也有人全部否定斯大林时期苏共对文艺的领导以及三十年来文艺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要求所谓的“创作自由”。这里有的是出于重新评价过去的愿望，有的是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争论时起时伏，对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影响。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为过去在肃反扩大化和历次批判运动中受害的一批文艺界人士恢复了名誉。在“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下，文学中也出现了一批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作品，它们提出了工农业中的种种迫切问题，揭露了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奥维奇金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最早表现出这种倾向，随后出现的这样的小说有特罗耶波尔斯基的《农艺师手记》（1953）、田德里亚科夫的一些农村小说（1953-1956）、格拉宁的《探索者》（1954）、尼古拉耶娃的《前进中的战斗》（1957）等，其中包括因揭露过多或调子低沉而引起争论或批评的爱伦堡的《解冻》（1954-1956）、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1956），这样的剧本有罗佐夫的《祝你成功》（1954）、阿尔布佐夫的《伊尔库茨克的故事》（1959）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对过去那种粉饰现实的描写、但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即充满悲观、怀疑的小说，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7，国外出版）。柯切托夫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1958）则是对这股揭露浪潮进行争辩的作品。

从这时开始，抒情的作品增多了。散文有别尔戈利茨的《白

天的星星》(1959)、索洛乌欣的《一滴露珠》(1960)等,诗歌有鲁戈夫斯科依的《世纪的中间》(1958)、普罗科菲耶夫的诗集《请去旅行》(1960)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1950-1960)是一部抒情的日记,改写的个别章节带有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的印记,但全书却多方面地反映了苏联五十年代的社会思潮。

五十年代末以来,一些浪漫主义气息较浓的作家,如格林、帕乌斯托夫斯基等,重新得到了重视,而苏联文学界从二十年代起曾经对浪漫主义抱着怀疑的态度。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文学界出现了一批所谓“第四代”作家:诗人有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林娜等,小说家有卡扎科夫、阿克肖诺夫等。他们大多反对继承文学传统,主张“大胆革新”,他们的创作宣扬个人主义,表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反映出青年中缺乏信念、精神空虚的迷惘情绪,如阿克肖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1964),有的明显地接受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流派的影响,如沃兹涅先斯基的《三角梨》(1962),引起评论界激烈的争论。

卫国战争仍是这一阶段创作的重要题材。肖洛霍夫的影响较大的短篇《人的命运》(1957,中译《一个人的遭遇》)注意到普通人的命运,在战争题材的开拓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它虽然调子有些低沉,却表现出俄罗斯士兵在经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之后仍旧保持坚毅不屈的精神。此后有一些小说,重视细节真实的描写,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感染力,但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为了突出“战壕真实”,或渲染战争的残酷,或通过主人公的言论笼统地谴责战争,或表现主人公的求生本能,或描写无谓的牺牲,如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1959)、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1959),流露出和平主义的调子。

这一阶段,要求“信任人”、“尊重人”的呼声增强了,关于艺术的人道主义内容和人性的讨论增多了。这方面出现了一些较